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拷问良知】	良知的底线——读罗征启《清华文革亲历记》有感	王允方
【劫后反思】	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	阎淮
【亡灵祭坛】	孤身探秘重庆红卫兵墓园	木子弓长
【历史镜鉴】	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的帝王气与痞子气	钱理群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拷问良知】

良知的底线——读罗征启《清华文革亲历记》有感

· 王允方 ·

在清华文革舞台上，曾经出现过多位显要的角色，其中大名鼎鼎的莫过于蒯大富，当年披着革命小将的外袍，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但终究是昙花一现，前后不过八百天。另有一位是蒯大富的对立面，文革期间处在风口浪尖，一直挨整被斗，险些失去生命的中层干部罗征启。回顾清华文革历史，离不开蒯大富，同样也少不了罗征启——尤其在后蒯时期，在迟谢当政、文革落幕前后的那些年里，罗征启一直身在学校，跌宕起伏，随势而行，官至清华党委副书记；很显然，他对这段历史是有影响的。罗征启在文革中的经历，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最近他的回忆文集《清华文革亲历记》问世，代表了一些耄耋老人的心愿，在岁月的最后阶段，他们要将个人的亲身经历与内心感悟说出来，写下来，留存于世，以尽自己的历史责任。

罗先生的回忆文集之所以珍贵，因为这是清华干部中不多的系统回顾文革经历的书。从2004年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算起，所出各书的作者皆为当年的学生。我曾与几位熟悉的干部、教师交谈，希望他们写文章，但都以记不住为由婉拒了，十分可惜。文革期间，学生是运动的动力，干部则是运动的对象。他们处在被斗挨整的地位，切身感受显然与革命小将不一样，个中的体悟只有当事人心里明白。从文革开始，工作组进校，老红卫兵掌权，到蒯大富上台，再到迟谢主政，十年之中，罗征启被四次隔离审查，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现在，他将自己的经历与想法平实详细地述诸笔端，警示世人，呼唤良知，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本书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三段内容作“代序”，道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危害以及责任者。书中共有十篇文章，涵括了清华文革的三个阶段：即老红卫兵阶段的“红色恐怖”、蒯大富阶段的昙花一现，以及迟谢阶段的强势领导。其中，前六篇主要介绍作者的亲身经历，后三篇缅怀师长黄报青和同事徐葆耕；最后那一篇比较有意思，写的是八十年代末，蒯大富刑满出狱后，在深圳向他当面道歉的情形。罗先生

政治阅历丰富，思路清晰，观点明锐，文字功夫好，加上写的都是亲身经历的那些事，所以读起来生动流畅，苦难中带了点冷幽默，其中一些当年的“政治事件”，现在看起来，真是荒唐透顶。

我想就下面三个问题，将自己的读后感想与各位分享：

一、关于“彻底砸烂”

综观清华文革的三个阶段，“彻底砸烂”理论都是当时掌权者们主导运动发展的基本思想。这种基于偏执极端、非理性、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是造成打砸抢盛行，群众组织分裂，以至于武斗内战开打的政治思想基础。1966年6月初，工作组进校，清华党委顷刻瓦解。“学校在任各级领导干部及一些老师被造反群众抓去、游街、戴高帽，批斗、打人。清华顿时陷入了丧失理性的歇斯底里‘红色恐怖’之中”（P09）。当时，风靡全校的思想武器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些游街示众、抄家打人等反人性的、暴力的、恐怖的行为，都是从这里学来的。”（P10）。八月份工作组撤离，老红卫兵掌权；他们鼓噪反动血统论，在“彻底砸烂旧世界”的口号下，无法无天，进行打砸抢；8月24日，竟然推倒二校门，血洗清华园，制造了清华历史上耻辱的水晶之夜。作者详细记述了八二四夜晚的恐怖场景：五六十位干部先被押到阶梯教室、科学馆，后被转到生物馆，遭受鞭打脚踹，挑逗对殴，爬地如犬，自辱互辱等种种非人性的虐待。看着这些逼真可怖的记述，我真难想象这会是清华学生的所作所为！

据说清华校史馆里关于十年文革的部分，只有三张照片，其中一张贺鹏飞，是作为正面人物展出的。我注意到本书中有一段记述贺鹏飞的文字，是在八二四事件次日，即8月25日他到审讯室进行视察的情景：“贺鹏飞脚踏大皮鞋，手提一条皮带”，“他从我前面走过时，看见我因为支撑不住他们规定的姿势，已经把头顶在地上，就用皮鞋踩我的头，并且厉声说：‘不许顶在地上’。他这一踩，我头上已经结了痂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虽然贺鹏飞是当日‘红色恐怖’行动的指挥者之一，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件事。”（P14）作者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书中强调指出：“从工作组开进清华园，到蒯大富翻身掌权这一段的历史，常常被忽视，甚至有意地遗忘掉，好像清华园在大动乱的十年中所遭受的破坏，所有的一系列血腥暴行，都源于蒯大富。这是不公平的。打砸抢烧杀，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我们深受其害，我们记忆犹新。”（P17）

与老红卫兵掌权阶段相比，蒯大富上台后奉行的“彻底砸烂”理论显然要高明得多。他仔细揣摩领袖意图，将这个口号叫响了，发挥得淋漓尽致。作者分析：“由于要彻底砸烂，所以引出两个估计：第一是建国后到文革前，我们国家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主导的？第二个是我们的干部队伍，大多数是好的，还是大多数已经烂掉了？蒯大富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当然都是后者。而且很明显，中央文革，乃至毛泽东本人，实际上都是支持和力行‘彻底砸烂’的。”（P26）

作者的这个判断，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个学生领袖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实。毛泽东说：“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414就不赞成；414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们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由此可见，毛本人是支持彻底砸烂提法的，只不过指点他要讲清楚。殊不知正是关于好人、坏人的标准不一样，两派从文斗辩论，发展为武斗对抗；像作者这样支持414观点的干部中，不少人就此成为蒯大富“彻底砸烂”的受害者。

作者以相当于全书一半的篇幅，叙述了蒯大富及其团派一小部分极端分子炮制的所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是怎么回事。作者写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件也许是清华在文革十年动乱中最荒唐、最胡闹的案件了。说它最荒唐、最胡闹是因为这几个受伤害、受委屈最严重的老师，根本就不能是个‘集团’。而且他们之中，除我之外，即便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都不可能的，何来‘反革命’，又何来‘集团’？案件的几个当事人有的终生伤残，有的含冤去世，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现在还侥幸活着，我想我有责任将我在本案中经历的实情记录下来，以此向清华师长、师兄弟、姐妹做个交代。”（P39）

这段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1968年1月30日作者被团派保卫部绑架的经过；二是被辗转关押，成为三堡囚徒的情形，期间遭到刑讯逼供，毒打致伤；三是靠着智慧和勇气，于3月28日凌晨逃出囚所；四是在414的接应、帮助下，南下避难，住了近五个月。可以说，从情节与文采而言，这段内容最具可读性，险情环生，扣人心弦；尤其是作者如何从《基督山恩仇记》一书中得到启发，如何设想越狱计划，趁着云高夜黑，步行四十里山路，终于寻得生路的那个章节，让人感慨命运之神对无辜者的眷顾。我们在看到打手们丑恶嘴脸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普通百姓的善心好意。

关押期间，作者遭到了不断的刑讯逼供。据他介绍，团派的刑讯逼供分为三个档次：第一个档次多半用拳掌打击，不用器械重物；第二个档次是重刑逼供，由几个打手上场，他们残暴无人性；第三个档次，则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刑罚，譬如几天几夜的罚站。（引自P52）作者曾被器械猛击腹部，肝脏打破，只剩下外面一层膜。他还被罚站80小时，以至心跳过缓，出现幻觉。（引自P53）四人帮倒台后，他见到了文学宓、饶慰慈，他们受到的刑罚重得多，可能多是第二个档次的；文学宓被罚站五天五夜；他们都落下了终生伤残。

蒯大富不仅罗织罪名，炮制所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贾某某、邢某某及六学生专案”，对广大持不同意见的群众也采取残酷打击、暴力迫害的做法，最后在清华园内挑起了百日武斗。1968年7月27日，蒯大富丧心病狂，竟然下令向开进清华的工宣队开枪，打死打伤几百人。他搬起石头，最终砸了自己的脚。

七二七事件和“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件结束了蒯大富的政治生命，昙花一现八百天。对于清华大学这段历史，有人提问说：假如蒯大富没有下令开枪，没有七百多人死伤；假如“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没有搞出人命，清华文革的结局是否会改写？对此提问，作者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一段写得相当好。作者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搞清史实、真相，而不是靠假设。史实、真相是蒯大富下令开了枪，造成几百人的伤亡血案。史实、真相就是蒯大富的‘大翻个’和‘彻底砸烂’理论必然要发展到武斗和内战。如果这次不开枪，在另外一些时候和机会里，还是会开枪的。即使蒯大富会暂时与迟群、谢静宜结成同盟，最后还得分手。因为极左思潮或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思想上是倾向于否定一切的，在组织上是倾向于分裂的。史实和真相就是蒯大富的‘大翻个’和‘彻底砸烂’理论必然会发展到反对公检法和军队。”（P117）他还认为：“至于‘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子，也就是因为死了人，又和七二七联系在一起，否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案、要案。全国类似的案件很多很多，都处理了吗？整个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有多少人，都搞清楚了吗？刘承娴老师的死，还是个无头案。”（P117）

蒯大富走下了清华政治舞台，上台的是毛泽东的两个亲兵：迟群、谢静宜。

如果说老红卫兵和蒯大富给清华留下的伤痛主要是打砸抢与武斗的后果，那么迟谢主政时期留下的伤痛则要深得多、痛得多。迟谢的政治路线与做法同样沿袭了“彻底砸烂”理论，使清华大学在精神上、文化传统上遭到巨大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1971年7月通过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宣称：建国以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影响极为恶劣的两个“基本估计”。两个基本估计是套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新的精神枷锁。

会议之后，迟谢首先改组校、系两级主要领导，由工、军宣队派员出任，推行外行领导内行；大学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废除“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实行“群众推荐，组织审查”。于是教育质量，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质量，一落千丈，积重难返。（引自P119）

二、兴起一种新的政治审查形式：办学习班。迟谢领导时期，学校办起了各种各样、大小不等的学习班，名为学习，实为整人，包括自己整自己，彼此相互整。作者写道：“我整过人，也被整过，个中滋味，我是很熟悉的。整人术最厉害、也是最可怕的一招，就是在威逼高压之下，要你没完没了地检讨，直至挖出‘私’字一闪念，挖到体无完肤，尊严扫地。还要你揭发检举别人，大义灭亲，揭发亲友。这种精神上的摧残、迫害，比逼供时的用刑，打你几拳，踢你几脚更可怕。一旦你的精神被打倒了，他们要你说什么，你就会说什么。于是到处是坏人，到处是反革命。”（P125）广大师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谨小慎微，度日如年。

蒯大富垮台后，“罗文李饶”案件也该结束了吧，但是工军宣队对此讳莫如深。迟谢延续团派的做法，继续对作者等人隔离审查。一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他才被解放，当时全校只剩下蒋南翔校长一人还被挂着。迟谢为什么对他如此恨恶，作者在回忆徐葆耕的文章“追思”中有这么两段话：“迟群走后，葆耕对我说：‘不好，他盯上你了。迟群是非常阴险的人，……他们认为你是414中极右势力的代表。727工宣队进校时414马上拆工事缴枪，逃过了这一劫。其实，真正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414，可是没抓住把柄。’李兆汉也对我说：‘的确如此。迟谢认为清华有一个拥护蒋南翔的‘地下复仇军’，有一个营，你是政委。’（P163—164）很显然，迟谢与蒯大富在政治路线上是一脉相承的。

就这样，“从1968年7月到1976年10月，迟谢两个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甚至根本不懂教育、文化不高的人，手执同样不懂高等教育的最高领袖的尚方宝剑，统治了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和教育战线长达八年，对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破坏，其结果就不言而喻了。”（P119）迟谢不仅将清华大学的文化道统砸烂了，同时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也“彻底砸烂”了。这是伤及国本的重大罪过。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从本质上说，蒯大富与迟谢二人都是信奉“彻底砸烂”的难兄难弟。作者写道：“七二七之后，蒯大富曾抱怨迟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迟谢也确实只将蒯大富送去工厂劳动，名义上审查，实则拖延，观察形势，再做处理。因为，对蒯大富这样一个毛泽东钦点的红卫兵领袖如何处理，是个大难题。他命案在身，而且许多挨整的干部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但他却是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当着他们的面，一再叮嘱中央几位领导‘不要反过来整蒯大富，不要又整他们’。所以迟谢只是在批判一个更加荒诞的‘516’案件时，把蒯大富的‘七二七’和‘罗文李饶’两个案件挂在‘516’案件上揭批一番了事。”

“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后，四人帮倒台了，清华文化革命的案件和解放以后到文化革命所有的冤假错案，才在时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的公正、公开、公平的处理下，大体上得到解决。”“至于蒯大富在清华执政八百天的结局，只能是一个没有明确结论的结局。”“没有明确的结论，也许就是最好的结论。”（P117）这种历史的无奈，我想可能只有中国才有。

文革十年，三个阶段，清华掌权者们奉行一条以“彻底砸烂”为基础的政治路线，给学校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彻底砸烂”的总根子不在清华，而在中央。文革期间，宪法选举的国家主席被打倒，各级政府机构被夺权，这还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彻底砸烂”运动吗？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彻底砸烂”到底砸烂了什么？“彻底砸烂”不仅批斗干部，捣毁建筑，伤害肢体，草菅人命，更为严重的是它砸烂了人们心中的道德规范，突破了人性良知的底线；它将人性之恶释放出来，在革命的名义下，无法无天，横行不羁。“彻底砸烂”理论又与以往宣扬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结合，成为我国现代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影响了几代人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一恶果，我想也不是老红卫兵、蒯大富，迟谢之辈预想到的。如今，这种偏执极端，非理性的思想方法，正在与时下盛行的金钱拜物和民粹主义情绪联手，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需要予以警惕的。

二、关于良知的底线

文化革命触及人们的灵魂，每个人都在政治舞台上表演。这些人性善恶的自然表露，十年之中在清华舞台上从未停歇过。

如果说以前清华文革书籍中，对于人物的记述一般多限于场景式的介绍，那么这本书中对于施暴人员的描写，则有许多特写的镜头。这是受害者脑中几十年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书中写道：

老红卫兵时期：“（1966年）7月底8月初全体劳改队人员集中在东大操场。太阳很毒，晒得烫人。我们上午拔草已经很累。一个据说是化工系的小伙子，长得有点像日本人，下令我们跪在发烫的煤渣地上，训了半个多小时。”（P10）

八二四夜里，在科学馆二楼。“走廊南端传出一阵喧闹，原来是几个手执皮带木棍的人要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林泰两个人对打。我听到喊声：‘使劲，使劲！’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我们的学生吗？怎么会这样！”（P13）

在生物馆，“黑帮分子排成一队，一个学生在前面训话：‘你们要吃饭吗，那就听好，你必须说：臭黑帮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感谢毛主席给饭吃。听见了没有？……’这时我认出这个学生好像是化工系的。”（P15）

蒯大富时期：1968年春节，作者被绑架到化学馆里。“对我用重刑的一个叫冯家驊的打手，非常残暴。他一般打你后，听到痛苦喊叫声，会露出得意的狞笑！”（P52）

“他们用那个东西直接打在我肋骨之下的腹部，我痛得连喊都喊不出了，肚、肠、肝、胃撕裂般疼痛。他们从轻到重打了十多下才放开我，我没躺下，像患佝偻病一样，卷曲着身体……。”（P53）

“我曾怀疑冯家驊是不是学生。我认为一个学生对老师下不了这样狠毒的手。后来了解到，他是一年级学生，而且他打我不是最狠的。打饶慰慈、文学宓更厉害。对饶慰慈，根本不能提到此人此事，她会全身颤抖，精神崩溃。”（P 6 0）

以上只是特写镜头中的一小部分，书中还有其他一些打手和告密者的身影。当年这些清华学生，在革命思想的蛊惑下，丧心病狂，充满戾气，完全失去了正常意识，失去了基本的人性良知，这是他们一辈子也无法回避的耻辱！

当然，在那个恐怖的年代，也有许多普通百姓，出于同情与爱心，对作者和家人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展现出人性良善温暖的一面。对此作者多有介绍，感念在心：逃跑中救助的解放军战士、同学和朋友；帮着保管好小提琴的邻居；照顾父母、小女的街坊，以及他特别提到的南下避祸时居住了五个多月的李衍平家人，李妈妈。

如何分析文革时期的人性表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作者没有细谈，我也不便展开。但是我注意到，他在书中有些地方，还是有意无意涉及到对人性的思考，虽然并不直接，也不具体。

文革期间，作者处于风口浪尖，是清华干部中被整得最凶的一位，惨遭刑讯拷打，致使家破人亡。那个年代，在威逼高压之下，受审者天天面对着检查、批判、检举与揭发，这种精神上的摧残与迫害，往往比肉体上的打击更为可怕，更加诛心；一旦精神垮掉，就失去了最后的防线，他们要你说什么，你就会说什么。据我所知，清华干部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守住这道心理防线的。

作者是清华中层党务干部，一位受过多年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此类严酷考验面前，他是怎样想的，怎样把握基本原则，确定道德标准，恪守良知底线的？这是我十分关注的。阅读中我将有关内容进行梳理，发觉作者虽然没有直接，但也近乎间接地做出了答案。

书中有三次（确切地讲是四处）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具体情况各有不同：

一、在“缅怀黄报青先生”一文中，作者介绍了黄报青先生对待审查的态度。黄先生是位德高望重、业务精深、才华横溢的老师，文革开始时任建筑系秘书，总支委员。“文革大动乱开始以后，戴高帽、游街、批斗干部老师是平常事。但是黄报青先生就不平常了。在批斗时，黄先生坚持蒋南翔是好领导干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喊‘打倒黄报青’可以，喊‘打倒蒋南翔’坚决不行。……。一次再次，他宁愿挨打至尿血，被赶到小河里，但绝不妥协。……。1966年9月在东大操场劳改时，刘小石（总支书记）叫我劝黄先生别顶了。我对他说：‘黄先生，您不要顶了，中央的意图我们也搞不清楚，硬顶没用，保护身体要紧。’他说：‘要打倒我可以，我现在拔草、劳改都可以，但是要我说打倒蒋南翔，打倒共产党，这不可以。’我说：‘你可以不说。’他说：‘不是我要说，是他们逼我的，我又不能说假话。’我又说：‘不是要你说假话，但你可以沉默。’他严肃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有些话不能不说。’就这样，他被反复批斗、用刑，导致精神崩溃，两次送进安定医院。出院后他沉默不语。”（P 1 6 0）

1967年底（有写次年1月的），蒯大富在大礼堂召开大会，批判作者在建筑系搞假四清，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报青。大喇叭狂叫。黄报青在家里，听到喇叭广播，从五楼北窗跳下身亡。

粉碎四人帮后，刘达书记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蒋南翔参加了黄报青先生的追悼会。他说：“黄报青是个好同志，值得我们学习。我知道他不肯喊‘打倒蒋南翔’，其实不必，我自己也喊过。小平同志也承认过自己是走资派嘛！”（P161）

二、一位专案组的李师傅曾找作者谈话，提到“工字厅学习班里有个你们都很熟悉的成员，在肉刑逼供下交代了一些问题。现在有人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压力下，丧失原则，交代问题，应当开除党籍。你认为怎么样？”这个问题，作者有过考虑，也曾与他人交流过。作者认为：“不应该处分。这种事例在文革中很多，关键问题是有没有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有没有伤害其他同志。如果没有，那就没有错误，不应处分。如果有，那首先是审问方的问题。受审者是被动的，是不应被追究的。”（P128）

三、作者谈到了自己对检查交代的原则。第一次在化学馆被罚站80小时，又服用了药片，昏昏沉沉不知说了什么。第二天冯家驊提审，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说，林彪是极左思潮的总根子。”签字者罗征启。他看出字像是自己签的，事情记不得了，觉得有可能说明自己违背了“只讲自己，不讲别人，更不能揭发别人以减轻自己的压力”的原则，故而马上说，“这句话不是×××说的，是我说的。”并同意签字。但是，审问者没有依照承诺将原先的纸条交给他，引为终身的遗憾。（引自P55）

四、1976年初，因周总理逝世引发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迟谢认为清华有个反动的裴多菲俱乐部，文学宓和作者是其主要成员。作者与文学宓等商量，认定三条原则：“第一，勇敢乐观对待，绝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同志；即便是素有嫌隙的人也不伤害；第二，大部分工军宣队都是好人，虽然有时受到左的影响。七二七当时的表现，是真情表露，我们永远感谢他们。我们不可伤害他们，以免有人利用他们的不慎重去挑拨是非，伤害他们。第三，尽量抓紧机会锻炼身体。”文学宓又加了一条：“注意教育好子女，小心不要讲错话。”（引自151）

分析上述四处情况，不论是作者对自己规定的原则，还是对在肉刑下交代了一些问题的干部的态度，以及在与黄报青先生交谈中提到的观点，可以看出他对即使在高压威逼下也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非常明确，十分坚定的，那就是要坚守住“不伤害他人”这一点。可以认为，“不伤害他人”是他的良知底线。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道德红线，一条不能逾越的人性底线。文革十年，思想混乱，人性扭曲，无法无天，能够守住这条良知底线，做到不伤害他人的人，实在不多呀！

在“不伤害他人”的底线之上，我看到了黄报青先生高尚的良知境界。他的内心“有一种比爱与善心更为强大的判断，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种更为有力的动机。这就是理性、道义、良心”。（引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面对拷打，他威武不屈，坚持观点，不说假话，维护做人的尊严。像黄先生这样有风骨的知识分子，难能可贵，令人敬重。

三、真相—宽容—和解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8年，刘达到清华主持工作，坚决平反冤假错案。“罗文李饶”案件也是在这时才得到了彻底平反和解决。作者在回顾建国以来历次运动后感慨表示：“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凡经历过解放后至四人帮倒台期间历次政治运动劫难的人，每个人的心灵上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都是失败者；也没有

得益者，都是受害者；国家没有进步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P102）我想可能正是这一基本想法，促成了他对孙耘事情的宽容与解决。

作者用较大篇幅介绍了孙耘事情的过程，并附有相关附件。客观地说，如果没有胡耀邦总书记的指示与干预，孙耘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作者详细介绍了自己对处理此事的看法，他在给黑龙江省招办负责人的信中表示：孙耘犯罪事实清楚，长期关押受审，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表示道歉，认错态度诚恳；他有过人的才能，希望给与一个机会。在给海拉尔公安局的信中，他代表被害人家属声明不再追究责任，希望释放孙耘。作者的处理方式为多数同事所赞许，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是“以德报怨”、“东郭先生”云云。对此，作者运用《论语》中孔子的解释：要“以直报怨”，即以正直的态度去对待怨仇，这才是正确的做法。（P105）

书中还提到了另一个人：冯家驊，那位毫无人性，曾对文学宓、饶慰慈和作者残酷施暴的小个子。“他被分到河北省一个工厂里。因为文革中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团四两派都不理睬他。后来他找了一个女工结婚。当那位女工知道他文革中的暴行时，竟然吓疯了。由于冯家驊知道她是因为自己的问题造成精神失常，只能一直守着她，法律也不允许离弃。”（P105）作者本欲对他追查到底，但闻此状况，心生怜悯，表示：“算了，到此为止吧。上苍已经有惩罚了！据说后来冯家驊改行了。他说：“是的，我错了。我学了针灸，现在为人治病，已经治好了一些人。我要用救死扶伤来洗刷自己过去的罪行。”（P106）

对于作者来说，上述两人无疑是文革中最为心寒的：一个是专案组组长，一个是最凶狠的打手，使他饱受折磨，终生难忘。如何对待这两个典型人物，作者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我想，我们应该把‘和解’的旗子亮出来。这个仇，报还是不报？何时报？如何报？其实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和解。两派要和解，清华清理了积累多年的冤假错案，也是为了达到全校的和解。全国也一样，应该和解。”（P106）

作者在分析了中国历史上怨仇相报的意识与文化，并对照了一些西方国家典型的和解例子后认为，我们必须从血腥的“有仇必报”、比较理性的“怨仇必报”，发展到“以直报怨”或“以德报怨”，“报”的目的是为了“和解”。

作者呼吁：“要化解清华各派之间的矛盾，只能走‘真相—宽恕—和解’这条路，这才能真正体现清华人的胸襟，才是对清华校训的最好诠释！”

“用真相换取宽恕，最后达到和解；希望这种宽恕、和解的文化，能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P108）

走“真相—宽恕—和解”的道路，这是作者真诚的心愿，也是一种善意的期待。因为只有真相公开的前提下，才能谈得到宽恕，进而有可能取得和解。五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梦魇的清华师生，孜孜以求，莫不期盼着能在阳光照耀下，真相告白，加害者道歉，受害者宽恕，彼此谅解，走向和解团结的新天地。但是，历史曲折晦明，事实差强人意，许多事件的真相不仅没有大白，反而一直被严严实实地掩盖着：我们至今不清楚八二四推倒二校门的真相；我们至今不知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贾某某、邢某某及六学生专案”的真相；我们至今不了解七二七蒯大富悍然开枪杀害工宣队师傅的真相……。当事者金口不开，讳莫如深。至于清华舞台上曾经出现的“平庸之恶”，包括那些用暴力逼迫干部自辱互殴的学生：那些白天打人，晚上打麻将的三堡打手；那些私设刑堂，刑讯逼供的专案组人员；还有那些727向工人队伍刺长矛、扔手雷的暴徒……，这些人像没事人一样，至

今扛着真相的包袱，没有忏悔致歉的表示，有的反而吹嘘当年所谓保护老教授的功绩。包袱不卸，真相不白，没有道歉，难言宽恕，更遑论和解。

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有“道歉”的规矩，更少能做到反思与自省。中国历来宗教底蕴薄弱，缺乏神明敬畏，也没有心灵向往，一般人很难做到自内的忏悔与救赎。有的人即使有悔悟表现，也往往是迫于外部的压力，而非内心主动的自觉与醒悟。

我很赞赏作者在处理孙耘一事中的宽容与大度。对于孙耘认错道歉的态度，我亦予以肯定，认为真不容易。但是，请恕我直言——我一直心有疑问：如果当年没有报考研究生这个背景，没有这一关乎改变其人生命运的巨大压力，孙耘将会怎么做？他是否仍会主动去向作者道歉吗？我看未必！同样的还有：如果不是由于妻子因知晓自己文革中的暴行而发疯，造成精神失常，此后只得一直守候的巨大压力，冯家驊会不会承认错误，改邪归正，用为人治病来洗刷自己过去的罪孽？同样未必！我认为，人性是软弱的，常常心怀侥幸，需要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被大喝一声，痛击一掌，才会猛醒。压力往往是治病救人的一剂良方。只有在足够强大的压力下，人性才可能幡然醒悟，驱逐邪恶，恢复良善，回归一个正常的人。战后的德国就是个例子。但现实状况是：由于生活中缺乏一种迫使自己静思顿悟的外界压力，社会上更没有一个强大的反思文革的舆论氛围，那些文革中的“平庸之恶”们至今逍遥自在，心无悔意，好像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没关系。几十年来，中国大地上文革的土壤没有被清理，文革的空气没有被清洁，文革的思维依然横行无阻，这就势必决定了作者当年提出的“真相一宽恕一和解”只能是一个空幻的愿景，一个遥远的彼岸。

前不久陈楚三给蒯大富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你的一句道歉就能把当年造成的罪恶一笔勾销吗？清华文革史上最黑暗、最丑恶、最血腥的两个案件至今被掩盖着，对于“揭黑幕”这一要求，我是不会让步的。我很赞同陈楚三的态度。蒯大富不是个平常人，他是个政治玩手，把自己捆绑在政治集团的战车上，精于政治算计，没有人性良知。我在给楚三的短信中写道：戈培尔说过一句话：“有些秘密将被带进坟墓里。”

其实在真诚的心愿背后，作者还有一个深藏于内的想法，这是耄耋老人的真实思想。这一想法在书中出现了两处，一处是在“缅怀黄报青先生”的末尾，他写道：“事过三十多年了，我常常想，发动这场大动乱的罪过且先不提，那些动手打黄报青先生，用刑逼供、迫害、侮辱报青先生，导致他精神崩溃，以致跳楼的人，到现在却看不见一个人站出来承认错误，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现在（法律）不会追究责任了，但我相信，良心——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心的话——会谴责你们一辈子的。”（P161）另一处在回忆迟谢统治下的清华，作者这样写的：“苍天在上，这世界还是很公平的。我常常想，在这荒诞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大体公平的报应。有些人伤害了别人，也受到了伤害。有的人伤害过人，也道了歉。有的人到如今仍未认错。我相信，他们的良心永远会受到谴责，而且迟早会得到报应的。”（P125）由此可见，作者的内心深处根植着“良心为大”“因果报应”这一中华文化的传统信念，这是他思想的底线。凡在清华文革中欠下良心债的人——当然包括蒯大富——都应当在这两句话前扪心自问，接受良知的拷问。只有还清了良心债，归途才会有平安。

2018年1月5日（6月初修改）

~~~~~  
【劫后反思】

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

• 阎 淮 •

2011年，是我们进入高中50年，又恰逢101中建校65周年。同班同学拟编写回忆文集。约稿推辞不掉，草此一文：《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节录于下——

### （一）回忆与感恩

高中三年，15—18岁，人生重要的里程碑。101中的养育让我在体智德诸方面良好发展，不仅使我在步入成年时三方面都有较高的起点，也赋予我终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 （1）体育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昔日革命和工作，是我最重要的资本；如今不革命不工作只生活享乐，更是重要的老本。故先论体育。

北京二中的初中三年，困难时期劳逸结合，停止了体育锻炼。体弱易病的我，经过101中的千日锤炼（体育锻炼与劳动磨练），不能百炼成钢，也千锤成铁。大学盛传“清华一条虫，出去一条龙”之说，我不敢苟同，君不见社会上的清华之虫比比皆是。在体育方面，我只能算是101的一条虫，但毕业后在大学和社会上，我却是香港最著名的演员——“成龙”了。

大学——首节体育课，老师指导双杠上的双臂屈伸。很多同学歪歪扭扭才能作几个。轮到我时，却轻松标准地展现。此时有人找老师谈事，过了很长时间，他猛回头惊讶地发现我还在不停表演。老师叫停我，注视我的光头，“你是101的吧？肯定会骑自行车，我是自行车队的教练，你来吧！”我就这样被“请进”拥有运动健将的清华自行车校队。

工厂——大学毕业当工人，我可以两臂各夹百斤水泥，轻松运送。“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原意是三个班都应有车间副主任跟班。我任主任时，每个班都跟四五小时，长期每天工作十几小时。高中的锻练传统、大学的继承光大，是我五年中，从工人爬到县团级厂长的物质基础。

近期——2007年在西藏五千米高原，活动量比年轻的导游还大，无高原反应；2008年更新驾照，从西四环到通州车管局，往返150里，半天骑自行车轻松来回；2009年美国首发猪流感，不回国是爱国，假装爱国一次；2010年与同学自如攀登北京最险要的、曾摔死数人的箭扣野长城；现在65岁的我，每天两三小时的乒乓球，然后游泳近千米。

#### （2）智育

初中时，无知少年只知玩。101使我“认真”完成了高中三年学业。此前我从来未认真学习过，是母校的师长和同学的言传身教改变了我、提高了我。当年清华考分最高的工程物理系（当时中国还无原子弹）150人中，就有我班三人、咱年级五人。这个奇迹，完全归功母校的智育教育。

101的图书馆，学校东北角孤立的小平房，室内与屋外同样人流稀少，人文期刊与科学杂志同样丰富繁杂。体育锻炼后至晚饭前，我经常在此流连忘返，广泛浏览各种报刊，如每期《新华文摘》都是从首页的社论看到末页的漫画。此处是我社会学科和人文知识的启蒙处，阅读多元化和爱好广泛性的发祥地。日后我能大跨度转变专业和职业，由“专家”轻松地沦为“杂家”，也得益于此。

101的课外兴趣小组是母校素质教育的一大特色，它丝毫没有当今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教育商业化的铜臭味。我是数学小组组长和物理小组组员，受惠有三：1、指导老师的开导点拨。（他们太辛苦太可敬了！）2、同学组员的切磋启发。（他们太刻苦太可爱了！）3、周末和假期讲座，聆听大师教诲。三年中几乎听遍了华罗庚等所有著名数学家、周培源等所有著名物理学家，为中学生所作的深入浅出的学术讲座。母校兴趣小组赐我的有形收获是北京中学生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的两个小奖，无形收获则是我终身遵循的科学态度和求是精神。

### （3）德育

对于非常重视德育的母校，所有同学在毕业时，无论身体强弱学业优劣（二者皆受先天影响、必有差异），革命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从毫无革命传统的初中进入具有深厚革命传统高中的我，无疑是政治起点低，思想改造难。幸好我的家庭还算有点革命传统，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在母校革命风气和政治氛围的严重熏陶下，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我进步了，我入团了。

101中使我树立了做革命接班人的使命感（早已放弃）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信念（现更坚定）。母校教会了我真诚，真诚的使命感和信念及其外在表现，使我中学毕业一年后就入了党。

## （二）反思与忏悔

人，真诚的人，应具有感恩精神、忏悔意识和反思能力。对于上述母校赐予我的一切，几十年来，我一直深怀着虔诚的感恩之情。同时同样，一、母校对于某类同学的不公正对待，我也一直深感不平、耿耿于怀。二、我主观上自觉地帮助非干部子弟，划清界线和改造思想，客观上不自觉地压抑了他们；我也一直忏悔不已尽力弥补，尽管没有任何同学当时和日后，对我流露些许指责和丝毫不满。

### （1）出国留学

毕业前夕，国家选派首届外语留学生，学校只指定几个干部子女。我向校长反映：我英语差不适合，班上其他“一般子女”更胜任。答复：“你们最可靠，要服从组织。”我相信了，我服从了，我心不甘、情却愿地进入出国集训团。在那里我发现“两个大部分”：一、各地的准留学生，大部分是一般子弟；二、他们都是团员，但大部分人远远不如101的团外群众。对于前者，我已尽力而无效。对于后者，我写信给班团支部，建议吸收所有申请者入团。起了点小作用，发展了几个，但还有一些好同学未能如愿，并非巧合，他们都非干部子弟！看到清华的芸芸众团员，我更后悔自己觉悟晚、行动迟，对不起中学未入团的同学。

### （2）毕业高考

1964年，极左思潮“激情燃烧的年代”，在较左的101中，毕业生们由于自己的学习成绩，更由于父母的“阶级成份”，自愿或被迫地踏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我们被分流了！

由于在上述“两个由于”中，我都占了便宜，便得以混迹于清华。在清华，也许是在全国，最机密的研发原子弹的工程物理系，也有“黑五类子弟”！这个“惊我”的发现，不得不让我反思——具有悠久深厚革命传统的101，太对得起同样具有革命背景的干部子弟。但母校和我，对得起没有革命家庭背景的可爱的同学吗？母校太革命了！她对“出身不好”的孩子太不宽容了！她的政治审查太认真、太严厉了！得了便宜的我，不能卖乖，我愧对吃了亏的同学。于是——

才华横溢的王某，父亲是民国县长，他只能“主动”放弃高考，“自愿”奔赴北大荒。我们劝阻未果，当时我的心情五味杂陈、至为惋惜。他离京前，我从清华，好不容易找到他在和平里简易楼内昏暗的家，向他告别，为他送行。他年迈、体弱、寡居的老母亲问我上哪所大学时，我第一次心虚声弱地吐出“清华”二字。

聪慧过人的徐某，爱国父亲徐璋本，弃美回国，清华任教，不幸系狱；“不识相”的他高分落榜实属必然。我到他家中，看望问候安慰，希望送给他一丝温暖，减轻我半毫负疚。第一个暑假，顶着烈日，我从靠近西三环的家，骑车穿过整个北京城到东三环外，徐当瓦工的房管所。平时我从不戴校徽，那天破例戴了，就要让工人们知道徐有清华的好朋友。我对师傅们说：“徐比我聪明智能，比我勤奋好学，就是随着倒霉老爹也倒霉了。”工友们够哥们：“明白你的意思。小徐人不错，放心！我们会对他好的。”几年后徐父出狱，我第一时间带着礼品，去他家拜访致意。——毕竟是我们的父辈错整了人家！

当年鉴于男女有别的潜规则，我对一些女生的遭遇不甚了解。事后得知，也只能深表迟到的同情和愧疚之意。她们都赞同我的认定，知青所谓的“青春无悔”，其实是青春无奈！我只能对她们说，对任何个体的不平等处理，都是我们全体的耻辱和悲哀，都是对全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

### （3）思想改造

社会上有多少个阶级阶层，学校中就有多少种“子弟”。在众多子弟中，被经常自称和他称的只有“干部子弟”——这个肩负特殊重大使命的群体。

革命干部要打击阶级敌人，干部子弟就要帮助出身不好者，与家庭划清界线。革命干部要改造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就要帮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愚昧荒唐时代，这是天经地义的铁律，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复的残酷悲惨的现实。

国家极左，领袖负责；学校左倾，领导有责；班级之左，责在我们干部子弟。因为，我们的三任班主任都不是党员，班内的政治思想工作基本由干部子弟为主体的学生干部负责。我最近得知，当年的语文老师曾说：“别的班左，左得可爱；你们班左，左得可怕！”更令我汗颜。

我主动热情地帮助出身不好的同学，让他们与倒霉的家庭划清界线。——“养儿方知父母恩”，我为人父后才知：“天大地大不如父母恩情大，爹亲娘亲比神马主席和党都亲！”父母的养育之恩，血浓于水、血缘浓于一切的亲情怎么割得断、划得清？对人的感情和精神最残酷地压迫、摧残和扭曲莫过于与倒霉的亲人“划清界线”了！

我积极诚恳地帮助中间出身者，提高其政治觉悟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人种存在近百万年，人类文明近万年，趋利避害和善恶并存的人性，没有也不会改变。政治觉悟和阶级思想等所谓“大节”都是臆造虚构的精神桎梏和政治凶器。君不见政治觉悟最高的副帅摔死异乡，无产阶级思想最纯的旗手吊死狱中。客观存在并应该重视的道德质量，即所谓的“小节”却被极端忽视。

生产力、生产品和思想觉悟“三个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太好了。但是，觉悟不会提高的丑陋的人类，不配进入那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高尚的天堂。——无论什么党在前面用胡萝卜领导，在后面用大棒鞭策。

当年喊得震天价响的“做革命接班人”，似乎是干部子弟的专利，对其他人只能是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上述一切，在客观上不自觉地压抑、压迫了其他同学，使101中的他们比在其它一般学校，更不自在、不自如、不自由。

#### （4）忏悔与补救

文革初，我被推选为清华红卫兵校总部委员。某同学的父亲，建国后首批海归爱国教授，其所在系的红卫兵，抄其家、抓其人。我得知后，立即施以援手。清华红卫兵干了不少坏事，我只能制止九牛一毛，错责难卸。

文革后，我班同学第一次聚会。我说，尽管没有被授权，我愿意代表干部子弟向其他同学诚恳深切道歉。尔后又屡次多边双边、公开私下表达歉意。

到中组部后，我更愿意帮助“非干子弟”升迁，因为他们的仕途更不易。例如1983年参与调配北京局级领导时，借机到公用局，建议提李某为副局长。

一贯追求进步的汪某，文革初在批斗被四个伟大点名为坏人的冶金部长时，推搡此人。文革后要把造反派头头“记录在案”，控制其入党 and 提干、读研和出国。钢铁学院把汪报上。我找他们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领袖点名、小将奈何。汪父只是矿院副院长，要是高院（最高法院）正院长，你们还敢记录吗？（当时，主席元帅子女当头头都不记录）”汪得以幸免漏网，后顺利国内读硕、赴美读博，发明两项专利。

没有背景的赵某，在深圳因离婚等“生活问题”出国被卡。我到广州出差时绕道深圳帮助疏通，使其顺利赴美。

88年在康华公司，王某让我把他的学生先调进康华，待联系好，再放行去美。平民子弟出国难，我照办。

#### （三）沧桑半世纪风雨五十年

令我欣慰的是，当年，无论大小政治气候如何风云变幻，我们班同学的关系总体是融洽和友好的。现在，其友谊恰似美酒，越陈越香浓；其友情正如香港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

更令我欣慰的是，目前，尽管还差强人意，但时代毕竟前进了：我们的子弟、子弟的子弟，再也不会被人为地划分为某某子弟，并因此被无端地剥夺某些政治权利和教育权益。政治民主尚待时日，政治平等初见曙光。

让我们共同祈祷和期待，祖国母亲的、所有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一个也不能少”地，早日真正沐浴到八九点钟太阳的和煦温暖的政治光芒！

#### （四）后记：我的旗帜上写的是“常识与良知”

有几位同学看了此文初稿，不解：“你一帆风顺，何以有如此反思与感受？”答曰：真正的人应该超越自我境遇。

“公共知识分子”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定义众多，无一定论。我则认为他们应是关注与自己无关之事的人，即管闲事的人。管闲事的利器就是常识与良知。每年回国前我都问亲友：需要什么？答曰：外国有的中国都有！我以为，现在中国似乎什么都不缺，惟缺良知与常识。让我们共同唤醒良知、普及常识！

“拨乱反正”是文革后最响亮的口号，它似乎只针对十年文革。我以为，对所有的乱都要拨过去、对所有的歪都要正过来，对文革前17年更要如此。因为，17年是毒因，文革是苦果。在智能才学方面，自高而低的胆识、见识、才识、学识、知识、常识，对领袖到草民，有不同的要求。但在社会生活的基本和基础层面上拨乱反正，最初级的常识足够。分辨阶级论与人性论、政治觉悟与道德伦理的是非真伪，无需高深理论和渊博知识。正常人的常识都可以分辨出——所谓无产阶级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生活观、苦乐观、恋爱观等等的荒谬可笑，基于人性论的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常识是理性的基础，现在应该是恢复常识，用常识判断一切的时代了。

孔子的立体塑像，竟然竖立在当年狠批他的领袖平面画像的斜对面。时下，孔丘语录《论语》比主席语录“小红本”更时尚。让我们也时髦一下，用儒家话语讨论道德问题。我以为道德的顶线是“己欲达，而达人”，这是我等凡夫俗子向往而达不到的圣贤境界，是特蕾莎修女、比尔·盖茨和慈济等大善人的处事原则。道德不可逾越的底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越位了就可能吃法律的红牌。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平民百姓思维和行为的模式，即公民的良知。“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不平则鸣不需要赴汤蹈火的勇气和两肋插刀的气概，只要我们秉承人的良知足矣。如果说，人性、人道、人权是真善美的试金石；那么，良知就是真善美的基础。良知是博爱的核心，让中国也充满爱吧！

（本文提到的几位同学，当年在公开发表前征得他们同意使用全名，本回忆录只用其姓。——笔者注）

以上这篇回忆文章在同学中引起强烈反响。有联系的30多位同学中，20多人发电邮和短信赞赏此文。如干部子女尚某说“我非常喜欢你的文章，你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步入社会后的感悟，用质朴的语言，对人生、对社会、对传统、对道德、对未来进行了深刻的阐述，给我启迪，令我深思和感动，甚至几次泪花闪烁。经历即财富，你的财富会伴随你一生。”平民子女李某电邮群发全班：“真的让我感动。有勇气，敢于揭开人人都回避的问题，敢于触及事情的本质。中国的政治害了多少人！应该道歉的人还没有站出来！你不必歉疚，那不是你的错。”

但是，此书编委会中的四位局级编委却有不同意见，在自费印刷的《不逝的青春——北京一零一中学1964届高三一班同学成长记事》中，对我的文章，和谐了敏感词语，磨圆了某些棱角，砍掉了整个“后记”。

为此，很多同学不平，我向全班群发《为什么我的文章和当初大家看到的不同？》。我解释说，“我在回忆录中写了，101中使我树立了做革命接班人的使命感（早已放弃）和为弱势群服务的信念（现更坚定）。对大多数弱势同学拍手称快的文章，某些已经接了班的接班人，即局级既得利益者有意见实属正常。”我感慨：“一个中国小民，在母国母校母班的回忆小集上，企图刊登一篇发自肺腑的人生感悟、感激于恩惠者、忏悔于屈辱者的小文。它既不反对四项原则，又不违背三个代表；既无精神污染之嫌，更无自由化之虞。竟然掀起轩然大波。这是为什么？呜呼！哀哉！”

□ 原载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2017年（节选该书第二章第三节2—13）

~~~~~

【亡灵祭坛】

孤身探秘重庆红卫兵墓园

• 木子弓长 •

那段历史仅仅过去40多年，60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都还有深刻的记忆，可那段历史已经模糊，残存于当事者的脑海中，很多人不愿提起，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影响深远的影视剧，没有一本反思深刻的书籍，也没有一座官方创办的博物馆。这是一段被否定的历史，但又那么讳莫如深，欲言又止，遗毒至今影响着这个国家，年轻的一代已经不太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重庆，这座巨大的西南都市，曾经的战时陪都，现在的直辖市，3000多万人口，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心区域，有一座建于1957年的沙坪公园，在公园的西南角，有一扇生锈的铁门紧闭，锁在里面的是一座荒草丛生的墓园，非常不起眼地隐蔽在一个小土包上。即使是天天在这里晨练的市民，经常在这里唱红歌的群众，很多人也不知道这座墓园，或者说不清楚这里到底埋葬的是些什么人。没有多少人还关注这处墓地，荒草已经将它掩盖，历史已将它遗忘，但这里却是中国仅存的一座红卫兵墓园，准确地说是中国仅存的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荒草之下，覆盖的是一段谁也不愿提起的往事。

斑驳的墓碑，丛生的杂草，113座墓下大约掩埋着404名文革武斗死难者，他们大多死于1967年和1968年，文革时期重庆武斗最惨烈的年份，这些根正苗红的工人和学生们不是死于抗击侵略者，也不是死于战争，他们死于同样“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另一派红卫兵，死于癫狂年代中的同事、同学、朋友、亲戚之手。

昨晚下暴雨，我在重庆的时间很短暂，如果今早继续下雨，我只能放弃去红卫兵墓园。半夜雨却停了，为了赶时间，天还未亮，我就起床从宾馆出发，坐公交车来到沙坪公园，来之前我上网查到，红卫兵墓园在天主教堂隔壁，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红卫兵墓园，我就直接问路人天主教堂怎么走，找到天主教堂后，发现红卫兵墓园与天主教堂之间居然有高高的围墙，一个在公园内，一个在公园外。

清晨去教堂的大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知道他们的忏悔和一墙之隔的红卫兵墓园有没有关系。发现走错后，我原路折回，重新回到沙坪公园，很快找到了红卫兵墓园。

墓园位于在公园内水泥路旁的一个小土包上，周边没有任何标志，要不是事前看过照片，很容易错过，一块新立的石碑标明这里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铁门紧闭，根据里面的杂草高度，可以判断出这里是不对外开放的，也许唯一的进入办法就是翻过铁门。

打扰了，诸位死难者，请原谅一位好奇的游客翻墙而入，我无恶意，只是想更近地触摸那段历史。于是，在天蒙蒙亮的雨后清晨，我一个人翻越铁门进入了荒草覆盖的红卫兵墓园，回头望望紧闭的铁门，我与外面晨练的人们已经完全隔开，翻过那道铁门，我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荒芜死寂的世界，但你的耳边似乎会响起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和口号，脑海中会浮现出挥舞的红旗、满眼的黄军装，从那个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年代到这座荒草丛生、静得出奇的墓园，四十多年了，墓主人们应该也习惯了。茂密的荒草掩盖了仅有的一条小路，昨夜的暴雨依然在杂草上留有水珠。

所有的墓碑都称不上精致，大多是红砖外抹水泥，很多都已经风化剥落，但大多数墓碑都高大，形似人民英雄纪念碑，草书的毛体在墓碑上随处可见，绝大多数墓碑都座西朝东，也许寄寓着是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吧，2011年的重庆“打黑唱红”出了名，2012年的重庆“翻天覆地”又出了名，但很多人不知，45年前重庆的文革武斗也是惊动中央的。这座著名的西南重镇、国家军工生产基地，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时间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至少645人死亡，曾以一夜间打了一万多发高射炮弹的纪录惊动了中共最高层而闻名全国。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时光倒回1967年的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地分为两大派进行，当权的“八一五”派得到驻军支持，枪枝弹药充足，在野的“反到底”派占据了最重要的军械制造厂，装备占据优势，由于两派势均力敌，重庆那个夏天的撕杀就格外带有浓重的血腥味。

“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的斗争，从1967年4月份的辩论开始，迅速升级为斗殴、武力冲突、千人武斗，到了当年7月8日，首次使用了枪弹，打死9人，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随后，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

据当事人回忆，1967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0人，打沉船只3艘；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

1967年的夏天，重庆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除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武装冲突，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两派激战三日，“反到底”派惨败，70多名战斗员当场死了4

个，7名俘虏也也被“八一五”派枪毙，而“反到底”派也枪毙了4名“八一五”派的俘虏，要知道这些所谓的俘虏，在文革之前，大家都是老老实实的工人、学生，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有妻儿父母的普通人。人性的恶一旦被挑起，真的十分可怕。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形，都是同事同学，都是学毛语录，无冤无仇，为何一定要刀兵相见，一定要你死我活，如今我们已很难鉴定谁对谁错。总之，埋葬在这里的普通人都死了，死在了同事或同学们的枪弹下，死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曾经热血的青年只能被荒草覆盖，被历史掩埋，谁都不愿意揭开这个疮疤。

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里共有113座墓，其中6座是早期的军人墓，有的墓没有碑，或者碑文已经风化不可考，这座墓园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从14岁到60岁，普通工人占了一大半，这与重庆的兵工厂和产业工人多有很大的关系。

“基建八一五鬼见愁战斗队1968年3月立”，这是描得最清晰的一块墓碑，当年的沙坪坝镇是“八一五”派势力范围的腹地，所以“八一五”派把武斗死难者埋葬在这里，因为“反到底”派再强大也难以攻到这里来。这些死难者有的死于“正规战斗”，有的则是死于流弹的冤魂。

40号墓的汪某某，是去支援兄弟单位在潘家坪激战中被打死的；29号墓的18岁朱某某，被川东石油局请去搞武斗，打了七天七夜，被一枪爆头身亡；而116号墓的何某某，没有参加武斗，在去替车间工人领薪水的路上，被一名17岁的学生当靶子练枪法给打死了。

看着墓前那些曾经年轻的面孔，无比感慨，他们的死在疯狂的大时代里只是一个小气泡，瞬间已经破灭，但他们的死对于活着的亲人来说，却是永恒的痛，家庭生活被彻底改变，子女失去抚养，父母得不到赡养。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十八冶革委会建设兵团，1968·1·25”，他们的墓碑上大多刻着“烈士”、“为人民牺牲”之类字样，可到了今天，又有谁还会认为他们是“烈士”、“为人民牺牲”、“虽死犹荣”呢？

这座墓碑上有一把燃烧着的火炬，仔细看会发现，火炬柄由“815”三个数字组成，这就是“八一五”派的徽记，设计者是当时《815战报》的总编周孜仁，之后他写了长篇纪实报道《红卫兵小报和我》等一系列文革回忆文章，重现了重庆武斗的诸多血腥细节。

墓园内的大多数墓都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37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多数合葬墓的主体设计是模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而这座墓是模仿人民英雄纪念碑最为逼真的，墓基四周还环绕着磨石栏杆。

只是当年都忙于阶级斗争，工程的质量实在差劲，墓基四周的栏杆已经只见地基，墓碑上水泥已经剥落，字迹已经模糊，再加上不知哪个年代的涂鸦在墓碑上，这座本想“庄严肃穆”的墓碑，如今在杂草中显得不伦不类

那几个斑驳的文字还显示着当年的激情，“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而另一面的字应该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砍头何所惧，革命志不移，敢上刀山下火海，誓死保卫毛主席。”对于今天热衷网络游戏、追逐iphone、向往出国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样的口号是难以理解的。我们无法责怪父辈们，在癫狂的年代，仅有的一点良知和理性也会无奈地被打磨干净，人性的恶被发挥到极致，坚持真理的如张志新般被割喉枪毙。

很多碑文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05号墓碑文悼词，“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吼声……”

其实红卫兵墓园是有一定历史的，1949年以前，沙坪公园属一户杨姓私家宅邸，抗战期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为了安葬因病去世的职员，在此置地建墓，墓园里筑有极讲究、规整的牌坊、引道等，周恩来之父、邓颖超之母亦曾安葬在这里，后移走。1962年以后埋葬了几位在中印边境阵亡和因病去世的军人，然后就是1967、1968年，埋葬了大量“八一五”派的武斗死难者。

重庆原来有三处红卫兵公墓，另两处已被毁掉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人认为红卫兵公墓是文革的耻辱柱，曾经强烈要求毁灭这个幽灵，它也几次险些被拆掉，上世纪70年代末，曾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重庆一中某校长，亲手把埋了几十人的红卫兵墓炸了。如今重庆市对墓园确定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2009年底，“红卫兵墓园”被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时至今日，集体的癫狂已经过去，无论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有碑文的，无碑文的，躺在墓园里的这些人早已变成了一段历史，除了个别墓偶尔会有亲人过来祭奠之外，大部分已成荒坟，随着老一辈逐渐逝去，越来越少人会知道其中的往事，会去了解那个血雨腥风的夏天。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参与武斗的他们，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他们大都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都号称为了保卫领袖，他们无冤无仇甚至是朋友亲戚，可他们用言语批判对方，用枪炮攻击对方，用酷刑折磨“俘虏”，甚至肆意枪毙“俘虏”。

翻墙出来，我再回望一眼那座荒芜的墓园，重新回到正常的社会，但我的思绪还没有回来，我知道有些人对那段历史，对那位领袖还充满了回味与崇拜，对当今的社会深深不满，我不了解他们的往事，更不理解他们的想法，但这些死难者也许是最公正的历史见证。

看着公园里晨练跳舞的叔叔阿姨们，他们都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你觉得他们是愿意在这里跳跳舞唱唱歌，还是愿意分成两派互相残杀呢？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地将拍摄于1980年的电影《枫》找出来看了一遍，这也许是中国唯一一部正面描写文革武斗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青年恋人文革后分别加入了势不两立的“井冈山”派和“红旗”派，分别成为骨干，最后在武斗战场上相遇，女方所在的“井冈山”派战败后跳楼身亡，男孩从此变成了逍遥派，谁知两三年后“井冈山”派重新掌权，男孩又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毙。电影的结尾，在他们的坟前，一个小女孩好奇地问爸爸：“叔叔阿姨是英雄吗？是烈士吗？”爸爸回答，“不是，他们是历史，历史的教训！”是的，躺在红卫兵墓园的这些人也是历史，一段可悲、可叹、可怜又可笑的历史。

□ 来源：微信号《木子弓长的驴游记》

~~~~~  
【历史镜鉴】

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的帝王气与痞子气

• 钱理群 •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与会者所

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

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

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

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

“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美元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美元的资产。”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 来源：新浪微博，2011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